

将军 从巴 黎 归来

● 张廷竹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9225330

将军从巴黎归来

● 张廷竹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



9225330

I247.5
779



(晋)新登字2号



将军从巴黎归来

张廷竹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0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74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

ISBN 7-5378-0472-9

I·450 定价: 5.80元



作者简介

张廷竹，一九五〇年六月生于香港，同年七月由母亲携回大陆定居。青少年时期曾历经磨难，务农八年做工十二年。一九八四年入伍。一九八五年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立过战功。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

自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迄今，发表和出版长篇小说五部，中篇小说三十六部，短篇小说五十五篇，评论三十篇。结集十册。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省以上军内外优秀作品奖十次。作品多次送往国际文化交流，其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史研究，尤为海内外读者瞩目。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理事、艺术委员会委员。

1987.12.1

内 容 简 介

作者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又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的后裔，以他独特的坎坷经历和艺术感受写出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五部中篇小说，结构新颖，情节曲折，时空交错，笔触雄奇，组成了色彩纷呈的多棱镜。历史从血泪横飞的黄土路上碾迹而来，一个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展开了敌对营垒中骨肉至亲、悲壮凄绝的仇恨与情爱。从国共两党的高干到善良的母亲、恶魔般的女谍，从旧时代的红色小姐至当今的纨绔公子，一大批真实可信的人物，催人泪下，引人深思，无疑，这是雅俗共赏，具有深刻启迪的一本自选集。

作者在海内外拥有大批读者，这是他的第十一本书，精选新作，尤堪珍存。

目 录

将军从巴黎归来.....	(1)
我不知道的中国故事.....	(114)
我不知道的外国故事.....	(182)
挣扎的黄昏.....	(244)
叛逆的兄弟.....	(304)

将军从巴黎归来

假如我的父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本文主人公的命运将引起他的深思。

——作者

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李宗仁回忆录》

第一章

珠江水依然浑浊，堤岸上却是一片新绿……

那一瞬间，他发蒙了。

是东京还是雅加达？

他缓缓地转过身去，朝车站大门的上面又望了一眼，是广州。

这是三月的一个黄昏，五点一刻，从九龙开广州的列车到站已有一会儿了。人们潮水般地涌出来，登上出租汽车和公共小“巴士”，或者争先恐后地挤上公共汽车。车子鸣着喇叭，驶向华侨大厦，驶向沙堤，驶向海珠广场。车站广场上渐渐的安静下来。而四周围的建筑物，从电讯大楼到流花宾馆，正咄咄嗒嗒地跳动着霓虹灯广告。“精工”、“浪琴”——“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太阳正在落下去，已经落到了车站大楼的背后。飘落在广场上的长长的阴影，带来了一丝令人快慰的凉意。南国的晚风吹起高健非的风衣的下摆，象一只老鹰在他的腿上拍打着翅膀。一辆公共汽车正迎面驶来，他向后退了一步。看到在那天蓝的车厢上涂画着三洋收录机、雷达表和宝宝乐的广告。他又蹙起了眉头。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敲了敲他的手肘，他低下头去，看到一张颧骨突出的小脸，鼻子被风吹得红通通的。

“同志，买报吗？”

彩印的《深圳特区报》。

高健非蹲了下来。

“唔，你多大了？你……，认识这报上的字吗？”

他抚摸着孩子的脑袋，那头发很柔软，带着一点儿褐色。他看到一双好奇的、略微有点儿惊疑的眼睛。

“我属牛，叫小牛。十岁了。我已经上四年级了呀；我家就住在那幢楼上，五楼一〇二，同志……呃，不，老爷爷，您几岁了？”

高健非挺起了身子。他顺着小孩的手指看去，看到在电讯大楼的旁边，有一幢公寓房子，门前种着榕树，那富有色彩的墙根下，正开满了早放的紫罗兰花。大楼顶上电视天线林立。

“我老啦，也是属牛的，八十二岁啦。你，为什么……卖报？”

“八十二岁？哟，比我奶奶还老二十岁呢！为什么卖报？学雷锋呗。”

小孩挥挥手跑掉了，十几米外有人在招呼买报。老人摇了摇头。暮色苍茫，风儿飘来一阵阵拖音很怪的粤语。他茫然若失。在巴黎、在旧金山、在里约热内卢，他无数次地听到过这样的语言，——“好靚呵，嗨姆嗨？”但是他始终没有学会使用这种语言。祖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亿人口，方言有几百种。他不是两广人，虽然命运曾经长时期地将他和近百万两广子弟联系在一起。他说普通话，国语，偶尔露出几句“哪个样”。他是四川乐山人。那儿有一座举世无双的大佛。

他转身向出租汽车站走去。他的步履矫健，软底皮鞋在柏油路面上发出嘹嘹的声响。他一点儿也不象八十二岁的老“牛”。

老了。我确实是老了。雷锋？我知道这个名字，一个当兵的，上士班长。做过很多好事，象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是中共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主义，实现那种主义的根本手段是阶级斗争。对此我深有体会。一九六三年初夏时节，当巴黎从睡梦中迎接黎明时，我照例下楼去拿邮差送来的早报。当时我住在通向马德兰广场的苏莱纳街上的新法兰西旅馆，那是一家小旅馆。但是，十分舒适。我不是什么大老板，我是一个小商人。一个潦倒的前中华民国将军。我的钱包和我的隐名改姓的身份都使我更喜欢这种比较朴素和不甚知名的地方。这里不会遇到熟人。我这二十年来，最害怕的就是被一声兴高采烈的“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的呼唤叫住。那天的天气很好，阳光照在餐厅的地毯上，照在月牙形面包、咖啡和黑色无核葡萄酱上面。邮差

是个快乐的高个儿小伙子，我对他不无好感，因为旅馆的老板娘称他为“伯爵”。伯爵？我猜想他是一个俄罗斯贵族的后裔，跟我一样，被红色风暴卷到了这远离故土的地方。那天早上他的眼神有些异样，也许这是我的错觉。事后想起来时一切都会觉得异样的。他向我微笑了一下，挤了挤眼睛——也许是在向老板娘挤眼睛吧，她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她是一个颇有些徐娘风韵的小布尔乔亚，有白嫩的面颊，白嫩的手脚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屁股。我打开报纸，首先是看到了一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我翻报纸的习惯与别人不一样，我不喜欢首先看头版新闻。我爱将零零碎碎的报道集中起来后才揣测头版上会有些什么爆炸性的消息。这样能使人变得更聪敏一些。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毛泽东的字，他的字自有他的个性。抗战胜利和谈时在重庆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他写的词，那一手龙飞凤舞的书法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首《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曾经使我浮想联翩，夜不成寐。于是我读了这则专题报道，知道大陆上有许多人正在向这个矮小个儿的上士学习，到处找好事情做。我不以为然地笑笑，我相信这是又一个新的宣传运动。这样的运动总是搞不长的，除了变着花样搞阶级斗争之外，中共不会提倡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事情。我甚至闭了一会儿眼睛，设想这个上士如果恰好将他的薪金掏出去帮人买车票时，知道了对方是个“地富反坏右”该怎么办？他会不会赶紧把钱重新放进口袋……这当然有点儿无聊，不过我不能不这样想。人的思想有点儿象百慕大三角区，不可思议。我相信我的李代总统也是一样……过了一年以后，在同样的初夏的一个早上，我又读到同一份早报，我一下子变得怔怔发呆。我看到了一张巨幅照片，这照片占了整整半张版面。李老头子和周恩来在北平——现在叫北

京了——机场上握手。我揉揉眼睛，向老板娘要一副老花眼镜，格老子，我从来不用这劳什子的，我硬朗得很呢，当初在讲武堂不是白呆的。可是这个早上却不得不用了……

贺龙、陈毅、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

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

格老子，哪个搞的！还有黄绍竑，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四九年四月在南京傅厚岗六十九号李宗仁的官邸里，我曾亲眼看到为了在“和平条款”上签字的问题，他俩差一点翻脸，闹得好多天不说话呢……

那天早上，咖啡凉了，面包也只咬了一口。我将这张中文版的《华商早报》藏了起来。我时常拿出来读一遍，看看这些故人的面孔。也附带着读一读那些“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文章。对于后者，我是当作消遣的。果然，后来的“造反有理”使他销声匿迹了……

可是今天，这个十岁的小孩，这个报童，居然又提到了他。人们又重新想起了曾经做过的一切，那么，会不会想起那些早已作古的大人物呢？……

高健非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他会老是想到这一切。一个中共军队的战士的名字居然会使他浮想联翩，而这分明是他一再告诫自己，不必再去想的事了。他现在作为巴黎一家不大不小的电器公司董事来参加春季广交会的，他的护照上的姓名是高宗元。他深信不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早已死了。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往事不堪回首，他不想再去回忆他从台北阳明山下那座被严密看守的小别墅里逃出来时的情景了。当了一辈子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打过武昌，冲上过汀泗桥头，

又上过缅甸，穿烂过几套远征军的将官服，身上还留着台儿庄的弹片，他自问是对得起“江东父老”了。三年内战期间，他是总统府的中将参军。当过几天广州行辕主任。那是在开玩笑，老蒋已经跑到小岛上去了，李宗仁也准备去香港太和医院“休养”，封他这样一个官职，无非是和新闻记者虚与委蛇罢了。中共新华社公布的战犯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可见人家还是心里有数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未能审查通过。因此他并不怎么害怕回大陆来看看。已经活了八十个年头，世纪同龄人，即便坐牢杀头也交代得过去了。再说，多少人回去过了，又出来了。怕什么？他无非不愿意再做一次新闻人物，不愿意连累别人而已。帮助他死里逃生的人至今还在台北，还有那么几个虚衔挂在那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儿女成群、子孙满堂啊。大陆上的家眷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高健非不大好想象。他只能根据这一点来得出结论：大陆是讲阶级斗争的，家庭出身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那么，何必再让他们见了自己尴尬呢？他是军人。军人的心应该冷酷一些。然而，几天前，公司董事会忽然征询他的意见，可否上广州跑一趟时，他居然咬咬牙，答应了下来。并且，提前半个月就到了。他至今仍有些困惑。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耳边对他说：这是你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中山路是广州的繁华热闹的颈动脉，天黑以后则成为一条明亮辉煌的大河，河面上流动着各种各样的车辆和行人。出租小轿车的纱帘遮挡着车厢玻璃。司机是个姑娘，梳着两根小辫子，这两根扎牛皮筋的小辫子引起高健非眼眶的一阵潮润。在国外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女性。在那里他只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烫发，上面散发着染色剂和冷烫香精浓郁呛人的气味。行车途中，车里

的录音机唱着歌儿，是女人甜润的嗓子在唱，“在这个时刻放慢脚步，看看花，看看书，听鸟唱歌……在这个时刻开放自己，伸出你双手触摸这世界……”高健非看到过法新社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说是邓丽君和奚秀兰正象洪水猛兽一样在吞噬着新中国的青年一代。他不太相信这一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了解中国的民风，知道一个小康人家的姑娘，在摇篮听到的催眠曲不是四季调就是孟姜女哭长城，到十八岁出嫁时也至多哼上几句盘夫索夫，楼台会而已。他很难设想穿旗袍、马褂的人会扭着屁股跳迪斯科，即便是穿中山装（关于这种服装的名称，他对外国记者尤其不满，分明是孙文第一个倡导此种服装的么，何以成了“毛式服装”？）或者列宁装罢，他也难以想象。他的女儿高翔会跳迪斯科吗？……

“对不起。小姐，请问这是谁的歌声？”

“苏小明，海政文工团的。”

司机回过头来，朝他莞尔一笑。笑靥很美，典型的东方姑娘。他怔了一下。他离开广州的时候，女儿高翔也跟这姑娘差不多大，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笑起来也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睫毛一眨一眨的。她跟着一个共产党人逃走了，因为她从父亲的副官那里知道了警备司令部要抓他。他们是中山大学的同学。她可能还活着，也许日子还过得去，——中共不见得会将它手下所有出身不好的干部都斩尽杀绝吧！可是她再也不会想念她的父亲了。一个孩子能忘怀父亲吗？能忘记在小花园里戏耍的情景吗？——将白色的羽毛球打上天空，嘴里喊着：“爸爸，你又输了！你打不过我！你只会瞄准，不会用脑子打！”羽毛球飞得很高很高，如同云朵透过阳光，飘忽着，悠悠然的……她能忘记这一切吗？

现在她的孩子也该有那么大了吧。……

“海政文工团？她是军人吗？……”

“是的。她是海军。”

不可思议。一个中共的海军女军官，在用这样甜美的嗓子唱这种歌，而不是唱：“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当汽车嘎的一声刹住，停在华侨大厦的台阶旁时，姑娘彬彬有礼地为他打开了车门。高健非抬起头来，看见有一位穿着双排扣深灰色西装，打着黑领带的老先生，正在拉开镶嵌着雕花玻璃的大门，他以老式的礼节先把一位金丝卷发的夫人让出玻璃门，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步下台阶。“啊，你的祖国确实很美！”这是用法语说的，高健非基本能够听懂。他低下了头去，朝司机姑娘欠了欠身子，他说：“再见。”

再见。

珠江的堤岸很长，当夜幕降临之后，一个从内地来的游客会象马季在他的相声《看电视》里所说的那样，赶紧命令自己“闭眼”。一对对的情侣依偎得那样紧，向整个世界展览自己的爱情。而从华侨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街景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都是司空见惯，平常得使人觉得腻味。但是这个老人却并非如此。他的黑色西装一丝不苟，领带是天蓝色的，头发略微有些蓬乱。他刚吃过晚饭，迈着几乎象陆军操典上规定的步子那样缓缓地走。他腰板毕挺，既不是很胖又不显得瘦，高大而且壮实，比他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轻二十岁。他抬眼望着浑浊的江水和在堤岸上行走的体态轻盈的少女，望着沿十字型花坛

缓缓行驶的发出嘶嘶声的“菲亚特”汽车和悄无声响的“皇冠”、“上海”；车中晒得黑黝黝的年轻司机不时迅速地扫视人行道，看看有没有要搭车的旅客。他在沉思。除了满街操粤语的中国人和汉字商标外，他觉得这一切与他想象中的故土，相去何止万里。

他想象中的祖国该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不清楚。当然不会是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汤，啃水蕃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象台湾电台和国外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他见到过这样的“记者”，穿着沾满烟灰和油污的不干净的西装，头发一直被到肩膀上，广角镜挂在肚脐眼上，在客厅里乱放臭屁，用各种肮脏的字眼儿说话……。“胡扯淡！”——这是高健非对他们所下的定语。他对这些报道不屑一顾。抗战前后他见到过爱得加·斯诺，路易斯·斯特朗和胡愈之等人，他相信现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记者连他们的小指头儿都不如。但是他也不相信大陆上已经是“到处莺歌燕舞”，是一个极乐世界。当他离开这块土地时，留给共产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烂摊子。他非常清楚。共产党不是如来佛，不可能哈一口气，说一声“变”，就变出一座座金山，一个个粮仓，一幢幢高楼大厦来的。因此他唯愿能够看到一个古风犹存的，安居乐业的，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的社会，就是莫大的幸运了。可是此刻他看到了一些什么？

他在走出华侨大厦之前，曾去服务台上拍了一份电报给公司，告诉他们已经平安抵达广州。他戴上了老花眼镜，向服务员要一份电报纸。女服务员漫不经心地递给了他。透过眼镜，他看到姑娘的假睫毛在微微抖动着。她脖子上套一根廉价的项链，被汗水打湿的地方已经露出铜绿。她在看书，书名是《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当高健非将写好的电报纸递给她时，看到她随随便

便地往抽屉里一塞。这使他很不愉快，尽管这份电报即便三天以后发出也无甚不可。而更令他不快的是那个金丝卷发的夫人已由穿双排扣西装的老先生陪着一起回来，也到服务台来拍一份电报。他看到女服务员立刻换了一张面孔，笑靥挤成一团，象一盆没有拌匀的什锦色拉。“啊，您好。您需要我做些什么吗？”——高健非简直怀疑她是在跟戴高乐夫人讲话。他看看这位夫人，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高鼻子——在巴黎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上走五分钟可以看到一百个这样的女人。她的手是红肿的，静脉曲张，血管又粗又大。高健非猜想她年轻时是个洗衣妇，嫁过十次丈夫，现在是一家洗衣店的老板娘，积蓄了一笔钱——这笔钱也许攒了三十年。跟她的第十个丈夫，一个老华侨出来旅游一趟。她在这里受到过头的优待和照顾，而一个昔日的将军，却因是同种同族，竟受到如此冷遇。

还有刚才那口浓痰。

走到离华侨大厦才十几步远的时候，他就看到一对男女在马路边儿上忘情拥吻。他们穿着喇叭裤，蓄着长发，那姑娘的胸部挺得象两座珠穆朗玛峰。高健非看得出了神。这里不是香港，也不是台北呀！就是台北，至少在他离开那里的时候，外表上还得讲一点儿“礼义廉耻”。他的额头上竟然沁出了细小的汗珠。他掏出手绢来擦，他猜想这是一对香港客。就在这当儿那女的发现了他，发现了一个老头儿在注视着他们。于是咯咯地笑起来，跟男子轻轻地嘟哝了一句什么。于是那汉子转过脸来了，这是一张醉醺醺的面孔，面颊红得扎眼。“丢那妈！”他居然跟老头儿这样吼了一声，在地上吐了一口浓痰！

广州。

一九四九年四月到十月，高健非是当局的最高负责人之一。

他曾经身穿中将军服，坐着“奥斯汀”走过这里的每一条大街。所有的人，不管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必须在他的面前低垂眼睑。

而今天，一个年轻的姑娘，一个旅馆的侍应生，可以待他漫不经心，只顾低头看她的克里斯蒂的小说。而这个不知羞耻的假嬉皮士，业余华侨，一个公园看门人或者臭皮匠的儿子，居然可以如此侮辱他，向地上吐一口浓痰！

他想起了一位外国记者的话：“在中国，随地吐痰是每一个公民所享有的最大自由。”

珠江水依然是浑浊的。它正在涨潮，潮水拍打着堤岸，发出呜咽一般的声响。高健非不是草莽英雄变成的将军，他是陆军武备小学堂出身的旧军人。父亲是前清秀才。巴黎和红灯酒绿的诱惑，并没有改变他渗入血液中的孔孟之道、三民主义等等封建的、改良的、传统的文化熏陶。二十几年浪迹海外，使他更加留恋故土上曾经有过的一切。不料……

看来，人民的生活已经改善了。不是一般的改善，而是大大的，根本的变化。但是……何处是他所要寻找的“根”？！

珠江大桥巍然耸立在黑黝黝的水面上，春夜很柔和，很温暖，星光灿烂。近处有一条铁链在缓慢地来回晃动，吱吱作响。那些臭气熏天的小阴沟和棚户已经不见了，高楼大厦代替了它们。但是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低矮的平房，一些手工作坊一般的街道工厂。年轻人在小摊上卖猪肉肠粉、啤酒、香蕉、菠萝、杨桃、煲仔饭。他慢吞吞地走着，象看显微镜一样地看他们脸上的面容。他绝对不相信有些人所说的话，“大陆上十亿人口只有一个思想”，“人们表情平板，做事迟缓”，……他看到了微笑，悲哀，无可奈何，兴高采烈和打情骂俏。